

“一带一路”倡议下巴基斯坦语言使用状况 对我国外语教育的启示

魏亚丽

(新疆医科大学语言文化学院 新疆乌鲁木齐 830054)

【摘要】 巴基斯坦作为少数将两种语言作为国家官方语言的多民族国家，在语言政策的制定和实际使用上存在许多辩证之处。例如，乌尔都语作为巴基斯坦的官方语言之一，将其视作母语的人非常少，但是在实际的交往范围中，它又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语言。英语作为“舶来”语言在巴基斯坦拥有着无可取代的地位。从其中既可以看到民族意识对于巴基斯坦人民的重要性，也可以看到在全球化进程中，巴基斯坦的变化与发展。巴基斯坦的语言政策给我国语言教育带来的启示是基于现实层面规划的制定与标准的执行。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的外语教育政策必须围绕服务国家建设这一总目标来规划、制定、实施和评估。我们必须将国家安全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利益作为外语教育政策制定、实施与评估的现实依据与衡量指标。

【关键词】 语言政策与语言使用；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外语教育

DOI: 10.18686/jyyxx.v2i4.33431

巴基斯坦是南亚次大陆西北部的一个国家，它地处印度河流域，曾经是英属印度的殖民地。在 1947 年，巴基斯坦和印度分别脱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其在独立之后民族意识觉醒，旁遮普族、信德族、帕坦族和俾路支族四个主要的民族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但是巴基斯坦的官方用语却不是四个民族中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而是由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英语以及境外的乌尔都语，因而形成了巴基斯坦两种官方语言并存的现状。

1 语言与民族的辩证关系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民族是语言重要的一个属性，从民族学的角度来看，语言是民族形式的一个重要载体。二战结束后，许多亚洲的国家独立，国内的民族意识也逐渐觉醒，语言的分支与发展越来越盛。这其实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发展规律，凡是追求独立与自由的国家都会先在语言上寻求发展，以此和其他的国家做出区别，确定自己独特的生存标志，进而发展自己的文化。所以国家和民族总是将语言作为国家权力的象征。除此以外，语言还会给本国人民在意识和情感上带来认同感和归属感，增强本民族的凝聚力，促进族群内部的联系和交流。如果是从民族意识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如果出现了多种官方语言，势必会影响到民族意识的统一，所以在巴基斯坦等使用多语言的国家，民族意识的觉醒与推动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2 巴基斯坦的语言与民族概况

巴基斯坦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属于波斯语系和阿拉伯语系，本民族包含的语言有乌尔都语、旁遮普语、信德语、普什图语、俾路支语、达尔德语、布拉灰语等，20 世纪 80 年代，旁遮普语的使用人数最多，

占据了全国 48.17% 的人口。而乌尔都语覆盖的范围非常小，最早仅有卡拉奇和海德拉巴的居民在使用，但是在巴基斯坦的宪法中却明确地规定了它的官方性，中小学的教育也规定使用乌尔都语，逐渐的使乌尔都语成为使用范围最广泛的语言。究其原因是因为乌尔都语在巴基斯坦独立之后，词汇发展的速度最快，总量达到了 25 万以上，足够包含当代生活的所有领域，可以说在便捷性上超越了其他任何语种。

另一个官方语言英语的确定是因为英国人在巴基斯坦进行了长达两百年的统治，英语已经融入巴基斯坦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中，即使在民族独立后，英语仍然是政府行政部门的使用语言，而且英语作为上层社会的通用语言，在巴基斯坦民众的心中也被看作是身份的象征，对于拥有独立主权的巴基斯坦来说，政府与民间的交流需要进一步地扩大范围，向世界传达出本国的政治立场和文化价值，因此政府文件、学术文献、重要官方和民间刊物都继续使用英语，私立学校、高等学府、军事院校和政商法界等上层建筑也普遍使用英语，通晓英语是在巴基斯坦的社会中人跻身上层社会和高薪职位的首要条件。

由此可见，巴基斯坦的双官方用语是由历史和社会等多方面因素共同造就的，乌尔都语和英语占据了整个社会的上层人士。

3 巴基斯坦语言政策的演变与使用

3.1 独立之初——推行乌尔都语

巴基斯坦在 1947 年独立之后，国父穆罕穆德·阿里·真纳随即在全国性的演讲中表明支持乌尔都语成为唯一国语，国家领导人率先做出表率在正式场合使用乌尔都语，使乌尔都语在本国的地位有所提高。教育部门是首当其冲加入语言改革的，小学阶段的教学语言全部

使用乌尔都语, 中学和大学对乌尔都语的使用也进入了实质性的研究阶段, 为此专门成立了乌尔都语委员会, 并在高等院校设立了乌尔都语教授职位。大量乌尔都语的书籍出版, 乌尔都语词汇也纷纷面世, 词汇量得到了迅猛的增长。然而在实际的推行过程中, 上层社会并不认可, 乌尔都语只能在中下层人民中普及, 尤其是随着中产阶级的增加, 人们发现, 英语更能帮助他们获得财富和权力, 是个人身份、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的标志, 这样一来, 社会中的精英大面积使用英语, 中下层的百姓为了改变命运, 也把孩子送到英语学校, 最终造成了乌尔都语的推行进入到“中间地带”。

3.2 20世纪50-60年代——倡导双语并行

1958年, 穆罕穆德·阿尤布·汗将军成为巴基斯坦新的领导人。武将出身的他非常赞成本国的精英教育由英语来完成。所以在他担任军队总司令时创办的培养军事精英的学校里, 明令禁止乌尔都语的使用。这样一来, 在政府部门推行了几年的乌尔都语被进一步取消, 文职官员也是在使用流利娴熟的英语进行交流。可以说阿尤布·汗对英语的支持超过了任何一个时期。1959年, 国家教委宣布乌尔都语正式成为中等学校和高等院校的教学语言, 这项政策得到了中下层民众的支持, 但是因为政策中没有明令禁止使用英语教学, 因此双语并行的轨迹由此展开。其他行政部门紧随国家教委, 推行了使用双语的决定, 最终使英语重新回到了“火红热闹”的状态。在此期间, 民间支持乌尔都语的团体集会和游行屡屡发生, 年轻人走上街头, 收集支持使用乌尔都语的签名, 并把所有能够更换的公共场所的招牌换成了乌尔都语, 阿尤布·汗统治集团为了平复民怨, 稳定社会, 在公开场所发表讲话时也都使用了乌尔都语, 但是这些仅仅只是表面现象, 以统治阶级为首的精英阶层对英语的推崇热度不减, 乌尔都语难有立锥之地。

3.3 20世纪60-70年代——偏激引发反对

穆罕穆德·叶海亚·汗执掌政权之后, 对前任的语言政策全部推翻, 领导人以维护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为由, 推行孟加拉语和乌尔都语。这两种语言分别代表了东巴基斯坦和西巴基斯坦。省政府正式的办公文件全部换成了乌尔都语, 这项看似偏激的政策遭到了英语使用者的反对, 他们代表精英阶层向政府提出了诸多问题, 政府都难以作答。而使用旁遮普语、信德语、普什图语、俾路支语等语言的地区人士也非常激烈的予以反对, 可以说这十年是巴基斯坦语言政策最为混乱的十年, 官方用语的确立反而带来了更多反对的声音。

3.4 20世纪70年代——宪法明确地位

1972年, 人民党领袖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开始执政。这是一个推行社会主义的政治集团, 但是经营思想却占据绝对上风。所以民众和统治者之间互不信任的问题非常严重, 国家在这一阶段的政策制定都谨小慎微, 在语言政策上仅仅实施了一项政策, 那就是在宪法

第251条中明确了乌尔都语的地位: 巴基斯坦的国语是乌尔都语, 在15年之内应该安排乌尔都语用作官方语言和其他目的。英语可以用作官方语言直至安排乌尔都语取而代之。这唯一的一条语言政策平息了精英阶层和中下阶级多年以来的语言纷争, 换取了至少15年的和平, 具有非常大的贡献。但是令人遗憾的是, 在布托执政的五年中, 尽管做了各种努力, 可是乌尔都语的地位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

3.5 20世纪70-80年代——政策流向激烈

1977年, 穆罕穆德·齐亚·哈克将军开始实施军法统治。这是一位来自城市中下层的将军, 他对劳动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 自然对乌尔都语也有着深厚的感情。乌尔都语和哈克将军一起成为统治合法化的象征。齐亚·哈克利用宗教和语言统一思想, 反对各省自治, 主张共同建设强大的统一国家。他将倡导改为命令, 要求所有人必须用乌尔都语讲话。成立了专门研究提高乌尔都语地位的国家语言局, 因此他被称为“乌尔都语的保护人”。虽然学校不再使用英语进行讲课, 可是为了防止人才流失, 少部分精英学校还在保留着英语授课, 因此人们又觉得政府在语言政策上不够诚心, 废除英语的决定过于仓促的说法甚嚣尘上, 人们对于使用乌尔都语的热情迅速下降。尤其是哈克将军允许精英学校备战高级剑桥英语的考试, 并在法律上保障这些学校的决策, 更是让人们对他的政策产生了怀疑。1983年的《巴基斯坦时报》报道说: 联邦教育部已经决定全国中学的自然科目课程除了用乌尔都语或各省地方语言以外, 还可以继续使用英语。这个与1979年完全相悖的语言政策已然让中下层公众对统治阶层不再抱有期待, 平静以待。反而是那些不适用乌尔都语的民族以此为理由认为既然语言政策可以如此草率, 为什么不能使用自己民族的语言取代乌尔都语。对于他们的反对, 哈克将军不以为意, 他认为国家的绝对力量还是掌握在少数精英人士的手中, 只要制定的政策不影响精英阶层的利益, 他的政权就不会受到威胁。民间的右倾政策也对哈克将军予以了支持, 所有现象都显示出哈克将军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独裁者。

3.6 20世纪90年代——视野逐步扩大

贝·布托是巴基斯坦的首任女总统, 在她任期间面对来自各个政敌的反对, 执政的20个月里, 她真正能够行使权利的空间非常小, 但是她却旗帜鲜明的主张在教育界使用英语。虽然在她执政时, 国家讨论过是否要废除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之间的差距, 但是这样的讨论没有带来实际的效果, 反而进一步扩大了英语的使用范围, 提高了英语的社会地位。最终确立的语言政策是从一年级开始, 所有的课程教育都应该使用英语教学。研究的最终结果是在基础教育阶段就增设英语课程。公众认为这个决定是帮助精英教育在巴基斯坦合法化, 消弭社会阶层之间巨大的贫富差距带来的不稳定因素。但是这项政策究竟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 还未实践就随着布

托政府的解散而解散了。此后，政权在穆罕穆德·纳瓦茨·谢里夫与贝·布托之间更迭了三次，可是语言的基本政策始终未变，英语在国内的地位与属性也始终“屹立不倒”，乌尔都语和英语之间的争执始终没有中断，可是哪一派的支持者都没有再提出新的论点。

3.7 “一带一路”背景下——五通理念

进入到新世纪后，国际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经济实体也有了改弦易辙的迹象，尤其是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已经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呼应。有关“一带一路”的会议、文论、工程日有所新，语言问题被摆上议事日程。习近平谈到的“五通”：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首先是以语言互通为基础的。有人提出在巴基斯坦的“一带一路”可以用英语作为通用语，它的确能起到“达意”的作用，但是难以“表情”，也就不能达到民心相通的结果，所以，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巴基斯坦的语言规划工作开始了，巴基斯坦政府组织专家对国内 50 余种语言进行调研，建立清单和语言数据库。在此基础上，编辑列国语言志，编纂单语词典、多语词典及各种专业词典，编写教科书及普及用书。这对整个巴基斯坦的语言政策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本国的统治者开始关注乌尔都语所蕴含的表情达意的功能，把语言政策纳入基本国策中。乌尔都语的国语地位被正式确立。国家的领导人不需要再刻意的引领人民向哪一种语言进行靠拢，语言智库和语言服务单位完成了语言引导和语言服务的工作，其中包括语言规划、语言咨询、语言教育、语言翻译、语言技术支撑等。巴基斯坦作为双语制国家在合作竞争中拥有了先天的优势，为其进一步发展并成为中东地区的核心经济体奠定了重要基础。语言成为国家和国家之间携手合作的必要输出物，曾经局限于国内的乌英之争也逐渐趋于平息，语言的功能属性逐渐强于政治属性，不再成为政党操控人民的政治工具，也不再成为社会阶层的划分工具，人民的语言使用获得了更多的发展平台，终于能够以全新的姿态和自如的选择站在世界的舞台上。

4 巴基斯坦语言政策对我国外语政策规划的启示

对巴基斯坦语言政策的研究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语言政策是一项具备战略意义的规划，官方语言和非官方语言的确定与经济发达程度、人口的规模等量化指标有着直接关系。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汉语一直是国家唯一的官方语言，在和各个民族语言共处的过程中达成了共识，随着国际经济共同体的形成，我国的语言政策也要面对以自身语言发展为出发点的维护和拓展工作，因此，巴国语言政策给予我们的启示是非常重要的。

4.1 以国家发展战略为基点调整外语教育定位

外语教育是国家未来语言战略的核心部分，也是国家实现各个方面战略规划的主要途径之一。这是由高速

发展的全球经济决定的。一个国家的外语教育程度决定了这个国家如何从本土向国际发展，所以任何语言教育工作的开展都应该是站在宏观的国家语言发展战略地位上，以维护和拓展为目标开展的。我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国，在新时期要对本国的外语教育重新加以审视，就会发现传统的定位中存在着诸多的不足，学科定位占据时间过长，形成的短视让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法在官方语言之外发展出新的语言，进而造成了偏颇或少寡的语言路径。而巴基斯坦的语言政策与我们恰恰相反的是，它们先是在宏观层面确定了语言的政策，然后在学科教育上加以实践，这种宏观-微观的思路对我国语言政策的调整和教育定位是具有启示意义的。

4.2 以深入调查研究为手段规划外语教育思路

定位的确立是为了语言教育的实践，当外语教育的定位调整之后，随之要做的工作就是对国家的语言教育进行新的规划。其实我国的语言规划一直都在进行，但是因为定位的偏差，总是体现出零星、局部和短暂的行为，这就使规划的结果显示出一种随机和盲目的性质。因此规划的指导思想、战略目标以及实施途径之间的辩证性还是需要更加认真的了解。从而使外语教育规划真正有机地融入国家语言战略乃至整个国家发展战略之中。为此，要根据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几个方面对我国外语教育的现状做出深入而细致的调查，要花大力气了解外语在我国的“前世今生”，对外语教育的重点和难点做到“心中有数”，评估我国现有的外语教育资源和教育能力，找到其中存在的不足和差距，为外语教育制定短期、中期和长期三个规划。以语种的调研为例，首先要调研各个语种在我国的教育规模和教育现状，然后对我国在未来发展中，需要使用的“关键语种”加以确定和进行更加深入而细致的研究。为各个语种之间的关系做一个明确的梳理，才能确保教育不至于因为外部资源的掣肘而在发展过程中出现后继无力的现象。

4.3 以理性审慎主义为工具构建外语教育体系

以汉语普通话为官方唯一语言对于我国文化意识的觉醒和文化主体的确认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也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我国外语教育的不足与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对外语教育在理论上的认识匮乏和把握偏差。对大多数人而言，包括外语教育的研究学者和从事教师，更多的是将外语当作工具，外语教育自然就成为掌握工具的一种方法，即使在当下国内语言教程的指导性纲要中，也是如此定位语言属性的，这种人为的狭隘认识将对语言的深入研究和发展的局限在某一个点上。直到外部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之后，人们才发现语言还具有权力和资源的属性。如果我们不及时更新语言认知，有意识地将语言和社会的发展做连接，那么语言就永远无法实现从工具性向人文性的转变。因此，以科学而审慎的态度探究语言的工具性，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轨道出发搭建语言教育的体系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方法。

5 结语

综上所述, 巴基斯坦的语言政策和巴基斯坦国体政体的建立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国家成立之初, 为了唤起民众独立的民族意识, 促进民族的团结统一, 语言政策支持乌尔都语, 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统治阶层和上层社会认为英语更有利于国家的发展, 尤其是使用英语可以有效地稳定当下权力结构中的精英分子, 这样就形成了双语的政策, 本是为了平衡上、中、下各个阶层利益的语言政策最后演变成为各个阶层的身份标识, 上层社会对乌尔都语有着或多或少的轻蔑态度, 自由主义者因为政见和宗教的分歧也并不过分反对英语, 所以, 上层社会的力量永远是社会的核心力量, 它们可以使非本土的英语和本土的乌尔都语形成势均力敌的局面, 甚至在某些方面完全凌驾于上, 因此, 在巴基斯坦的语言政策中双语政策的政治属性是更为鲜明的。而巴基斯坦的语言政策给我国语言教育带来的更多的启示是基于现实层面规划的制定与标准的执行, 这对于唯一官方语言的多民族国家来说, 更具各现实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家对外开放迈上了新的台阶, “一带一路”倡议,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中国外语教育提出新要求、新挑战, 高校外语教育必须高举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的旗帜, 深化改革与发展, 砥砺前行, 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彰显大

国力量, 发挥大国作用贡献更多的力量。新时期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互利互惠、合作发展, 离不开语言的辅路, 当前, 我国在加强国语教育的同时实施多语种语的外语教育政策, “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使非通用语的发展迎来了质的飞跃, 非通用语言专业的开设具有重要的国家战略意义。与此同时, 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外语教育与国语教育的关系, 在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方面, 应当明确这样一个基本思想和原则: 国语教育永远是根本, 外语教育始终要为国语教育服务。中国外语教育的最终目的应该是服务于国家建设。在“一带一路”建设中, 中国的外语教育政策必须围绕这一最终目标来规划、制定、实施和评估。中国外语教育政策必须将国家安全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利益作为外语教育政策制定、实施与评估的现实依据与衡量指标。

作者简介: 魏亚丽 (1974 年—), 女, 甘肃榆中人, 副教授, 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 社会语言学, 心理语言学。

基金项目: 2014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 (14XJJCZH006), 2018 年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 (18YJC740155) 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 [1] 傅小强. 巴基斯坦民族宗教概况 [J]. 国际资料信息, 2013 (2): 26-29.
- [2] 官忠民. 王锐俊. 巴基斯坦独立后的语言规划及纷争 [J]. 东南亚纵横, 2014 (7): 11-17.
- [3] 官忠明. 巴基斯坦独立后的语言问题之一 [J]. 南亚研究季刊, 2002 (1): 19-20.
- [4] 李红毅, 李建军. 语言的权利与权力的语言: 试析乌尔都语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不同地位 [J]. 贵州民族研究, 2017 (4): 33-34.
- [5] 林良光. 东巴基斯坦语言运动 [J]. 南亚研究季刊, 1998 (1).
- [6] 陆钢. “一带一路”下的巴基斯坦战略角色 [J]. 社会观察, 2016 (5): 115-116.
- [7] 张治国.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语言问题 [J]. 语言与文字应用, 2016 (4): 3-8.
- [8] 满在江, 等. 巴基斯坦的语言与民族关系探析 [J].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3).
- [9] Simpson, Andrew. Language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Asia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100-115.